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四輯

G-6
000088
V4

內部資料 負責保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編印

1956年7月26日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四輯）

目 錄

- 1、卡德尔：南斯拉夫共產黨為全國各族人民獨立，為人民政權，為經濟復興及其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的情形……………（1）
- 2、德熱拉斯的副報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問題……………（29）
- 3、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南斯拉夫勞動者社會主義聯盟的簡介……………（37）
- 4、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章程（第6次代表大會通過）……………（40）
- 5、關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任務與作用
（1952年11月7日第6次代表大會決議）………（53）
- 6、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名單………（63）
- 7、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6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名單………（70）
- 8、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二中全會於1953年6月在波里恩島通過的決議（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各級組織）……………（72）
- 9、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公報……………（80）

- 10、鐵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第3次(非常)
 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詞 (82)
- 11、鐵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第3次(非
常) 中央全会上的閉幕詞 (95)
- 12、關於思想斗争的一次挑战的实质(卡德尔在南
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第3次(非常) 中央全
会上的报告摘要) (99)
- 13、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中央全会的決議 (121)
- 14、鐵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六中全会上的
 开幕詞 (122)
- 15、共產主义者聯盟各基層組織在改善經濟中的任
 務(阿·蘭科維奇在南共產主义者聯盟六中全
 会上的报告) (130)
- 16、波·斯坦姆博利奇在南共產主义者聯盟第六次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167)
- 17、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六中全会上
 的总结發言 (189)
- 18、卡德尔: 論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聯盟在社會主
 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 (199)
- 19、南斯拉夫劳动者社会主义聯盟宣言和盟章
 (1953年南斯拉夫陣綫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
..... (214)
- 20、附: 關於弗拉多·傑吉耶爾的材料 (233)

卡德爾報告：南斯拉夫共產黨為全國各族人民獨立，為人民政權，為經濟復興及其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情形

南斯拉夫共產黨自从國土遭受法西斯勢力侵犯時起，直至今天為止所經歷的道路，乃是為我國各族人民獨立，為人民政權，為全國經濟復興及其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中獲得偉大勝利和成功的光榮道路。只有在與人民公敵作多年斗争中受過鍛鍊並在此斗争中達到較高思想水準的黨，才能擊潰優勢敵人而獲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正是這種情形，才使我覺得以正確利用一切可能以及凡為客觀條件所容許的一切辦法來消滅了敵寇和國賊。

若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只是在戰時才與廣大民眾發生了聯繫，或認為它是由於戰時某種“有利”情況而“偶然地”取得了對於民眾的影響，那就根本錯誤了。恰正相反，還在戰爭開始很久以前，南斯拉夫共產黨就已在民眾中間爭得了堅固的陣地。黨不僅表現自己是擁護工人階級、農民及一切勞動群眾經濟要求的先進戰士，並且還表現自己是南斯拉夫唯一徹底堅定的政黨，它在民族問題上持有明確的立場，它喚起群眾去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決和平等、為民眾民主權利而積極奮鬥。我黨動員群眾保衛國土以防軸心國侵略威脅的政策，在加強我黨影響中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

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在非常秘密狀態下，在兇殘恐怖及追究條件下活動的時期達到了內部的鞏固，清洗了自己的隊伍，並

在組織上擴展到了全國各地。毫無疑义的，1937年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铁托同志領導下实行清党和巩固本党组织的事实，成了勝利底前提及其最重要因素之一。党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内部已是团结一致，革命精神很高，并且已与群众打成了一片。可見，还在战争以前，我党已是國內最强大的一个政治要素了。

这一情况在1941年4月間南斯拉夫受到德意侵犯的时候，以及在遭到敌寇佔領的最初几个月內表現得更为明顯。

（一）在对法西斯寇軍 和民族叛徒進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党

我党在四月間的战争阶段上所進行的路綫，首先就是：用全力擴大前綫抗敌动作，撤換庸碌軍官和賣國軍官，將各个战綫区段上的抗敌領導职务交給能幹的愛國者担任；武裝民众，特別是武裝城市工人，並組織他們协同軍隊作战，巩固軍中反法西斯勢力；極力強調必須成立能够領導抗战的民主人民政府；由於敵軍在前綫上拥有極大优势，所以認為必須採用游击戰術來协助反德意侵略者的抗战动作。

当然，我党所採取的这种政策，在四月間的战争阶段上是不能达到实际軍事成效的，因为当时南斯拉夫旧軍隊由於旧南斯拉夫很大一部分上層軍政分子实行了叛逆政策，潰滅得異常迅速。一切反动分子——連參謀总部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內——都故意想方設法赶快結束战争，因为他们是打算着無論战争怎样結束，他們总能在与敌寇合作的条件下为自己保持政权。当时一部分反动分子以与敌寇合作來保証自己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侨居國外的反动分子，即流亡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则在外人協助下想方設法，預

备到戰爭結束時重返國土，以便繼續執行其腐敗的反人民政策。很明顯的，所有這些老爺們根本就沒有認真想過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而是一舉一動都從自己私人利益及其所侍奉的帝國主義主人利益出發。

寇軍佔領我國後，首先當然就來對共產黨施行最厉害的打擊。但我黨因本身團結堅固並擁有多年地下工作的丰富經驗，所以不僅經住了恐怖的壓迫，並且成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運動中的領導力量。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四月事變後所持的政治路線是很明確的：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去為民族解放奮鬥，用怠工和破壞手段繼續武裝抗敵鬥爭；揭穿各種反動賣國分子並使其脫離人民大眾而陷於孤立，同時鞏固工人階級在人民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因為這是進行徹底鬥爭的必要前提；揭穿流亡政府中那班應對可恥投降負責的反動分子底賣國作用；展開反對敵寇及其幫兇賣國賊的全面鬥爭；進行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以便在適當時機舉行全民武裝起義。

抗敵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有其政治方面和組織方面。在政治方面，黨爭取了人民解放戰線最廣泛的發展，同時又採用了各種抗敵鬥爭形式，其中包括對敵寇各種設施實行抵制與怠工，消極反抗，隱藏糧食並對敵寇造成種種經濟上的困難。為了在抗戰綱領基礎上團結一切愛國勢力，黨曾設法與各黨各派上層分子取得一致行動，但黨並沒有局限於這點，並且同時又建立了群眾的人民解放戰線委員會或其他的下層群眾統一組織。這樣，黨就獨立地發動了群眾反對敵寇的鬥爭，同時表示願與其他黨派上層分子中一切愛國分子和愛國集團實行合作。

当时加入到人民解放战綫中來的，确实有各老旧政党中的个别集团，以及各該政党上層分子中因受民族天良和愛國情感驅使而走進人民解放斗争陣營的个別人物。但同时必須特別着重指出，各老旧政党上層分子整个說來，以及各种採取“西方方針”的反动派系和假民主分子，馬上就採取了与敌寇合作的路綫。其中有些人是公开这样來做的，另外有些人則企圖暫時伪装一下。然而事变進程很快就把他們弄得水落石出，於是他們不得不在人民面前表明自己的本來面目，表明其为敌寇帮兇助手的賣國賊面目。旧南斯拉夫統治派系这样演進，当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不是一件在战争时期才开始的事情。大家知道，現今流亡國外的南斯拉夫“民主健將”，不管現在他們那些反动的美國及其余帝國主义老板怎样說他們是不幸受到“共產主义”追究，但实际上他們却起初曾策划过並与希特勒訂立过條約，而后来当他們这种條約把戲沒能完全如願以偿时，他們又想方設法使南斯拉夫旧軍赶快投降。至於后来这班老爺及其信徒們用他們与敌寇合作的手段繼續执行这种路綫的事实，不过是証明他們始終在貫徹自己的路綫罢了。

这班老爺为什么如此始終一貫地賣國呢？原來就是因为他们战时也如战前一样是人民公敌。特权的富豪階層，各种資本主义剥削分子和他們的帮手，以及其余的反动集团，在战时也如在战前一样懼怕一切人民民主运动。他們認為每一次民众运动中都含有威脅到他們利益，威脅到他們制度的危險。所以無怪这班反动老爺在民主势力与敌寇决斗的时候，也就毫無犹豫地站到了敌寇方面去，站到了帝國主义制度保护者方面去。賣國成了这班反动人物活动的基本原則。我國反动派在战争时期也仍旧执行着这

一原則——無論其中公開拥护希特勒的那一部分人，亦無論其中屬於“西方方針”派的那一部分人，都是如此。這班賣國成性的反動分子和剝削分子，是覺得帝國主義敵寇要比拿起武器的人民較為親近，較為貴重的。他們卑鄙無恥和殘酷無情地踐踏民族利益，因為他們害怕武裝人民會威脅到他們剝削者階級的利益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底利益。若是沒有發生過積極的人民解放運動和武裝起義，那末反動派也許能在某種程度內掩蓋他們這種賣國面目而使民眾無法認識，亦如在其他某些國家內所見到過的那样。可是武裝起義鬥爭的發展，却使每個人都必須明確表示出自己的面目。賣國賊們一天天拋棄了自己的假面具，而一切忠誠和愛國的分子則離開了他們的陣營。

在此種情形下，單靠各黨派上層聯合來爭取人民解放戰線，當然是不夠的。必須用全力爭取下層民眾統一。我黨爭取着從下層建立群眾性的人民解放戰線委員會，同時又力求與各黨派上層分子取得統一行動，結果就促進了迅速揭破那些冒充愛國者的清談家，使他們不得不暴露出自己的立場：究竟他們是拥护向着全民武裝起義發展的人民解放運動，還是主張與敵寇合作。武裝起義鬥爭的進程本身把這種分化貫徹到底了。在普及到我國每一角落的劇烈武裝鬥爭條件下，每個採取“中間”立場的人都是很快就得表明他自己究竟站在那一方面。

組織上准备武裝起義的工作，首先是表現於1941年4月遭到失敗後，立刻就在極秘密情形下開始成立各地軍事委員會。各地軍事委員會底任務，是要進行組織上的準備，設法收集槍械，訓練軍事幹部，組織個別怠工與破壞動作。當希特勒進犯蘇聯的時候，我們在南斯拉夫全國各地都已佈設有這種委員會，它們在武

裝起义第一階段上就能成為直接領導起義的機關。

造謠中傷的人們常常常用以反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一種“論據”，就是硬說我國人民抗敵武裝起義運動大規模的展開是直到希特勒進犯蘇聯以後才開始發生，而不是在此以前就已經開始發生。根據此種“論據”，他們竟希圖“證明”，說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戰時所重視的根本不是本國民族獨立的利益，而是什麼其他的利益。為要表明這種“論據”絕頂偽造與純系造謠中傷性質，單是指出我黨遠在4月間就已開始建立負有具體作戰任務的軍事委員會這一事實就够了。另一方面，當希特勒勢力控制英吉利海峽而在整個歐洲沒有一個軍隊抵抗德意法西斯寇群之時，我們無法展開廣大的人民起義運動，原是很明顯的。除此而外，在遭到4月潰敗後，民眾本身也還沒有立刻準備好來實行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以上三点，就是南斯拉夫共產党中央於1941年6月号召南斯拉夫一切愛國分子發動廣泛抗敵游击鬥爭以期將這一鬥爭發展為全民武裝起義時所根據的主要因素。到七八月間，游击队的活動已普及全國，並開始迅速轉變為全面起義了。到九月間，我們已擁有很大的一個解放區，而南斯拉夫共產党中央政治局在同月中旬已由伯爾格來得移到了解放區。當時就成立了游击队總司令部以及各民族總指揮部，由鐵托同志擔任總司令。

× × × ×

我們的兵力蒸蒸直上地增長起來，而這種增長過程一直繼續到戰爭結束時止。我們舉行過多次進攻，遭受過嚴重犧牲，但人民解放軍的兵力總是不斷地增長，解放區逐年擴大。廣大民眾響應了共產黨關於舉行武裝起義的号召。這樣就證明南共中央把發

展游击战争当作武装起义抗战主要形式的路綫是正确的。在人民抗敵武裝起义斗争中南斯拉夫共產党路綫的勝利，首先是由四个因素，即本党策略中四大要点來保障的。

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南斯拉夫共產党自从國土被佔时起就已採取的明确的武裝起义方針。党經常都努力爭取与一切决心参加武裝起义的党派及愛國集团合作。然而我党並沒有使起义斗争的發展進程依此种努力的結果为轉移。党在發展武裝起义，建立解放区人民政权並展开全國人民解放运动时，始終努力進行了夺取群众的斗争。南斯拉夫共產党不僅表明它是人民抗战武裝起义底倡導者和組織者，而且是这一斗争中最徹底最有組織的先進部隊，是人民解放战争底領導力量。不言而喻，正是这种情况，才使我党能与人民大众取得極密切的联系。

当时在我們党内也有过一些頑固的教条主义人物，他們硬說游击战只能成为武裝起义底一种补助手段，無論如何也不能成为它的主要武器。他們說，能决定武器起义成敗的不是山林和鄉村，而是城市。因此他們認為我們把工人从城市調到游击队中去，或甚至使党底領導机关退出城市而部分地改成为軍事領導机关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这种以及諸如此类的理論，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运用武器的一种机会主义觀点底反映。我党中央路綫底勝利，推翻了这种机会主义“理論”，而証明在我國遭受凶狂法西斯寇軍佔領的条件下，同各城市和区域中多方面積極活動配合進行的游击战，正是到达勝利的最好最速而且唯一可能的道路。

当然，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党並沒有局限於組織初步游击队的工作。游击队总司令铁托同志自始就提出了建立正规軍隊的明确方針。初步的游击队多多少少是固定在某一区域

內，而受當地游击队司令部指揮的。雖然這種游击队是群众性的力量，並以其英勇战斗而在全國人民抗敵武裝起义斗争史上寫下了光榮的篇章，可是如果局限在初步的游击队範圍內，顯然就会在會戰中遭到失敗。當時必須建立正規軍，它不僅能消耗敵人力量，而且能歼滅敵人，战胜敵人，能進行正面會戰，能佔領城市和碉堡，能解放全國領土。因此，總司令部一待时机成熟，即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就已開始從游击队中挑選出精銳部隊及優秀戰士來成立了一些不固定在某一區域的機動旅團。這就是我軍按總司令部統一作戰計劃隨時調遣和運用的最初正規部隊。這些單個旅團後來發展成了師團和軍團，成立了人民解放軍。按其紀律、軍事知識、战斗力及作戰方法來說，人民解放軍與基本上始終是群众武裝起义初步組織形式的游击队迥然不同。所以，鐵托同志在1942年末曾如此估計這一過程：

“建立人民軍是迄今南斯拉夫人民起义斗争中最偉大的成功。

這是個長期艱難的過程，因為我們的人民軍是由一些細小游击队中誕生出來，由沒有武裝而奮起對敵寇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愛國分子、農民、工人、忠誠智識分子及城鄉青年建立起來的。

曾必須用重大犧牲的代價從敵人手中奪得每一支步槍，每一枚炸彈，每一粒子彈，每一挺機槍，每一門迫擊砲和每一尊大砲，並且必須抵抗住那在人數和技術方面都更為強大而拚命想把我們游击队和旅團消滅，想把我們人民起义斗争扑滅的敵人所舉行的多次進攻。由此可見，我們的人民軍並不是從上面發號施令用強迫手段成立，並不是用從工廠中供給的武器來實行武裝的…。恰巧相反，我們英勇人民軍中的每一員戰士，始終都是在

剧烈战斗中用流血的代价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而这些武器原是我國民族叛徒，即南斯拉夫旧軍高級長官和將領在去年四月間無恥地奉送給敌人的。

各师团和军团的建立，我們人民軍的建立，正是开始於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已造成了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当时已有这样來作的必要，当时已成立了許多旅和营，当时这些旅和营已差不多拥有一切武器（除飛机外），当时已不能用先前的方式來指揮各旅、营及大隊，最后就是当时我們已收復了很大一部分國土而已經必須举行大規模的進攻战……”（铁托著：为南斯拉夫解放而斗争一書，第304頁）。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共產党並沒有將發展游击战和武裝起义斗争視為只是削弱敌寇力量，消耗敌寇力量或压迫內部反动賣國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是从最初就認為游击战是达到人民最后战胜敌寇及其在我國內部帮凶分子的道路。

人民解放斗争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線的特殊發展，關於这点我在前面已經說过了。人民解放战線的一致不只在於統一的政綱。特別决定人民战線發展的有如下兩种原因：

（一）人民解放战線要求每一加入其中的政治集团和每一个分子都要用某种方式來積極帮助人民解放战争。曾有过——特别是在初期——一些政治家，他們在口头上同意接受人民解放战線的一般政綱，但不贊成武裝起义和游击战争。还有过不少的人在口头上是民主派和愛國者，实际上則主張只有等到战争結束时，只有等到盟軍來解放我國时，才可实行起义。此种人物和政治集团是要人民解放战線不致成为战斗組織，而只成为專門發佈一般宣

言的团体，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們只是想把人民解放战線当作他們暫時藏身之处，等候反动势力將來重新取得領導作用。南斯拉夫共產党不僅沒有同意把这种政治集团和人物接受到人民解放战線中來，並且还在群众面前揭露了他們，暴露他們是敌寇后备勢力，是敌寇暗藏的支柱，南斯拉夫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線所执行的这种政策，便使这一战綫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量，並且揭破了所謂“民主中間派”所玩弄的一切賣國詭計，这种“民主中間派”一方面提出些假冒解放和假冒民主的口号，另方面又攻击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線，說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綫引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去作…冒險行动，去受無謂牺牲，而不願靜待盟軍來解放我們。所有一切真正民主分子和真正愛國分子全都加入了人民解放战線。其实，人民解放战線發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使反动賣國勢力脱离群众而陷於孤立的道路，是使劳动人民和一切民主愛國分子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團結起來的道路。

（二）人民解放战線或如后來在南斯拉夫解放后改称的人民战綫在組織上的發展，是与这种政治內容相合的。偉大解放斗争要求各族人民在統一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其結果便造成了人民解放战線及其所有一切团体領導上的統一。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的，是本战綫內所有一切下層組織底團結一致，它們使得各陈旧反动政党底各个地方政治团体根本無法得逞。於是，人民战綫就成了人民强大統一战斗組織，它始終都不是在什么党派联盟基礎上或党派人数均等委員会基礎上活动，而是在人民战綫統一的下層群众組織基礎上活动。人民战綫这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我國所有一切真正人民民主愛國力量底独立而統一的群众組織如此發展的事实，便在动员群众進行解放战争，一致反对敌寇以及內部反

動附敵賣國勢力的事業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人民解放運動勝利的三個因素，就是地方人民解放委員會。我國人民解放委員會這種政權機關，是在1941年間，即當我們最初成立了幾個解放區時就產生了的。它們在幾年以內由低級形式發展成為高級形式，結果便成了全國從下至上統一的國家政權制度底基礎。

當然，人民解放委員會並不是偶然產生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人民解放戰線底領導人知道，武裝抗敵起義底成功是要依基本民眾，即城鄉勞動者積極參加及其战斗決心為轉移的。然而為要動員這些基本劳动群众，單靠提出一些人民解放的口號還不够。關於這點，鐵托同志曾說過：“當然，在發動群眾來加強和鞏固人民戰線的事業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是民族問題的正確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解決以及在新南斯拉夫實現根本社會改造的明確前途。無疑的，沒有這種明確前途，我國各族人民就會不能經住如此艱苦的解放戰爭條件”（引自鐵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戰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當然，也曾有過一些人說什麼建立人民解放委員會和實現民眾某種革命民主要求，便會使某些階層和政治集團離開人民解放戰線。南斯拉夫共產黨堅決反對了這種立場，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戰線果真走上了這條路，那它就不會獲得群眾的擁護，更確切點說，人民大眾就不可能用這樣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拿起武器來努力進行鬥爭，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努力進行了鬥爭，是因為他們不僅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並且看到了他們的民主願望與社會願望必將實現的前途。後來實踐確實證明了，人民解放起義與人民民主革命過程的結合，不但沒有減弱起義底打擊力量，而且使它具

有了對於民众的異常巨大的吸引能力，具有了牢不可破的坚固性和生命力。

当时必須打破並消滅專為剝削者利益而压迫民众的那个可恨的旧政权，必須保証新南斯拉夫今后再不会如先前那样是个民族監獄，而会实现全國各族人民自決和权利平等。必須特別強調說明，可恨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旧制度永远不会回复。絕對不可容許那作为一切賣國殃民勢力集团中心的帝制恢复。必須对工人，農民及全体劳动人民保証：他們能为自己創造出比他們在旧南斯拉夫时代要过得好些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曾必須在解放区内實地證明給民众看。

因此，我們在解放区内立刻就把旧國家机关和旧國家政权形式根本破毀了。人民解放战綫底口号是：解放区的全部政权，在不受純粹軍事需要所限制的范围内，一概屬於人民解放委員會，換句話說，由人民，即農民，工人，一切劳动者和忠誠愛國分子來掌握这个政权。鐵托同志講到人民委員會时說過：“这种人民政权形式是人民所熟悉的，其所以熟悉，是因为他們早已等候过这种政权，渴望过这种政权，朝夕思慕过这种政权。这正是最適合於我國各族人民的那种政权形式”（引自鐵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战綫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按其形式說來頗与苏維埃相同的人民解放委員會，是根据南斯拉夫的具体环境和依据我國人民抗敌起义進程中的特点建立起來的。

所以，人民解放委員會及其所進行的某些革命民主措施，当然就使我國所有一切賣國反民主集团瘋狂起來，它們甘願联合最惡毒的勢力來从人民手中拔去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人

民解放委員會却非常迅速地在人民中博得了極大的聲望。在整个戰爭期間，人民解放委員會在把全國廣大民眾團結於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線中的事業上起了巨大作用。也正因为人民解放委員會，即真正人民政權擁有這種力量與聲望，才使解放區人民政權最高機關的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能於1943年11月29日在亞依茨召集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廢除流亡政府，禁止皇室返國，並宣佈把南斯拉夫改為基於民族權利平等的聯邦國家。反法西斯大會最終批准了人民解放委員會，以及建築在這種委員會上直至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為止的全部國家政權結構，以此作為我國全部人民國家政權的唯一全權機關。這一步驟大大提高了人民政權底威信，並意味著全國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運動和人民政權的最終轉變。

可以說，南斯拉夫人民抗敵武裝起義和人民政權底發展，是人民解放戰爭與在力求達到社會主義更高形式的工人階級領導下所進行的人民民主革命進程互相結合的特殊例証。

我們勝利的第四个因素，就是我們在戰爭中對盟國持有十分明確的態度。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人民解放戰線底全部政策，都是力求加強反希特勒聯盟內部的團結，作為戰勝法西斯敵寇的條件。雖然如此，但我們並沒有否認必須公開批評盟國相互關係上應分加以批評的地方，以便使我國民眾對於實際情形和力量對比有一個明確的觀念。正因為如此，所以南斯拉夫共產黨很容易就剷除了在戰爭最後階段上出現的某些機會主義傾向底影響。有些人居然幻想在戰爭結束後將開始一個什麼帝國主義議會制和平發展的時期，而不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及其一切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的時期，不是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必得利用一切機會來企圖擺脫民

主力量方面的压力，以便放肆——如果民主势力不來阻止此点的話——实行其新的帝國主义向外擴張政策的时期。

南斯拉夫共產党在战争期間以及战争剛結束时都打击过这种幻想。親身經驗过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擺脫了这种幻想。在这点上，武裝起义成了最好的教師。在战场上最易認清誰是真朋摯友。假如沒有武裝起义，那我國各族人民也許不能看清这点，也許不能揭破假民主的詞句。可是我國民众知道西方盟國为什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所給軍械援助甚为薄弱的原因。我們各族人民因米海洛威奇匪股及其他叛逆直到战争最后一天和战后时期从國外所獲得的援助，却付出了自己鮮血的代价。他們親眼看見了西方盟國在战争中許多不誠恳的表現，並注視了某些帝國主义集团在第二戰場問題上所玩弄的各种陰險政治手腕。所有这些及其他許多沉痛經驗，都教訓了我國民众不要信任口头言論，而要根据实际行动來判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國人民對於帝國主义“民主”或對於帝國主义“好轉”的說法，也就沒有持过什么幻想。

同时，我國民众又根据本身經驗一天天更加确信苏联底偉大解放作用，确信其对我國解放战争的誠恳援助。我國各族人民清楚看見苏联担负着战争的主要重担，並注視着苏联底政策及其对各被奴役國人民的誠意援助。因此，他們已了解到，苏联所進行的斗争同样就是他們本身的斗争。我國各族人民正是在战争期間最明确地了解到，苏南兩國親密联盟是我國各族独立的主要保障。南斯拉夫共產党始終不懈地指明这一切事实，因为它認為正确解釋國際关系和在这一問題上採取正确立場，是为动员群众剷除各种有害幻想和孤立並粉碎我國反动賣國勢力而斗争的極重要条件。